

# 我没有当上英雄那就写写英雄

中国文学艺术名家系列访谈

## 人物

徐贵祥，安徽省霍邱县（今属叶集区）洪集镇人，1959年12月出生。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，中国作家协会军事文学委员会主任，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长。曾任排长、连政治指导员、集团军政治部干事、师政治部科长、解放军出版社总编室主任、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、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文艺创演系主任等职。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《弹道无痕》《天堂信号》《班务会》等，长篇小说《历史的天空》《马上天下》《四面八方》《英雄山》《琴声飞过旷野》等，以及中短篇小说集《司令还乡》《鲜花岭上鲜花开》《将军远行》等。曾获第七届、九届、十一届全军文艺奖；第八届、十届、十一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；《历史的天空》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。

### 3

我是一个军人，最终没有当上英雄，但并不影响我有英雄理想。

青年报：这些年你在中短篇小说方面也出手不凡，比如《鲜花岭上鲜花开》获得第十八届百花文学奖中篇小说奖，《红霞飞》获得第十届“茅台杯”《小说选刊》中篇小说奖，《将军远行》获得2021年度人民文学奖中篇小说奖。你是如何保持这种创作激情和对生活的新鲜感的？

徐贵祥：我可以用一个现成的例子来回答。两个月前，去浙江乌镇参加第十一届茅盾颁奖典礼，在浙江文学馆有个对话活动，一位女大学生向我提问，她写了一部小说，四万多字了，写不下去了，问我怎么激活创作激情。我问她，你那四万字，你自己觉得怎么样？她回答，我觉得还好。我跟她讲，那好，你回过头来看看你那四万字，把你认为还好的、让你感动的、让你激动的、让你冲动的那些情节挑出来，分析一下为什么会让你“三动”；把那些让你没有太多的感觉的部分先放到一边，然后把那些让你“三动”的故事和人物接着写下去，再写四万字，再筛选……讲到这里，我还可以分享我的一个体会，一个作家，写作到了一定程度，除了阅读他人作品以外，也应该有一个对自己的重新认识。回头看看，自己的哪些作品受欢迎，哪些作品再读一遍自己不脸红，哪些作品仍然让自己热血沸腾。发现自己的潜力其实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一个作家不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里，就像一个守财奴不知道自己的珠宝藏在哪儿，是很大的资源浪费。

青年报：《历史的天空》《对阵》都是抗战时期的故事，似乎离我们比较远。你能否说说，那种永不过时的东西是什么？

徐贵祥：只要是表达感情书写命运就永不过时。我们今天看《红楼梦》，看《悲惨世界》《罪与罚》《复活》，会感到过时吗？文学作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，高出的这一部分首先在于文学作品有一个提炼和锤炼的过程，是生活的



典型。我们每天都在生活，千万年来都要吃喝拉撒，矛盾冲突大到战争小到家长里短，基本上大同小异。文学作品就那么几万、几十万字，不可能像流水账一样什么都写，能够进入我们的作品，一定是那些典型人物和典型故事。文学作品高于生活还在于它是经过作家创作的，从选材、结构、人物关系、矛盾冲突等因素，从技术到艺术，有一个漫长的劳动过程。这就好比，任何一座建筑都来自于泥土，但是泥土不等于建筑，需要从泥土里找到矿石，提炼成钢，还要把泥土烧成水泥，再要设计图纸、拼接组合，然后才有建筑。这是一个道理。

青年报：你曾说过，“我没有当上英雄，既然命中注定我这辈子当不上英雄，那就让我好好地写写他们吧”。英雄和作家，你更看重哪一个身份？你以前的作品，都是反映军人生活，现在是一个和平年代，而且你离军营也越来越远，以后有没有写平民生活的计划？

徐贵祥：这是我的心里话，我是一个军人，做梦都想当英雄。

因为种种原因，我最终没有当上英雄，但这并不影响我有英雄理想。我崇尚英雄，特别敬重那些在国家危难关头挺身而出

带领国家和民族走出困境的英雄，也崇尚那些视死如归的战斗英雄，像杨靖宇、赵尚志、张自忠、范子侠……这里我要特别讲一个故事，曾经在一个资料里看过八路军新编第十旅旅长范子侠的几句话：我前进，你跟着；我站住，你看着；我后退，你枪毙我。这个人当过国民党军官，牺牲时是八路军指挥官。坦率地说，但凡构思抗战题材小说，我的脑子里都会浮现出这个人物，比如《八月桂花遍地开》里面的沈轩辕，《历史的天空》里面的石云彪，《英雄山》里的凌云峰和谢谷，《对阵》里面的郑亦雄和田齐鲁。尽管他们身份多变，但是他们的第一身份是中国人，在民族危亡的关头，他们深明大义，最终成了抗战英雄。我敬仰他们，也梦想成为他们，但是我没有做到。那么，作为军旅作家，我有责任，有义务，也有能力来书写他们，并通过他们的艺术形象唤起民族责任感。



可以为电视剧提供优质基础，这是不言而喻的。我也看过电视剧版《历史的天空》，我觉得很好，编剧和导演能够把握原著的精髓，演员进入角色也很精准。记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名单公布之后，我给导演高希希发了一个短信：众人拾柴火焰高。我说的是心里话，我很感谢编剧蒋晓勤、姚远、邓海南和导演高希希。

讲一个插曲。当初拍电视剧，我去易县探班，正赶上拍摄“岳秀英捍卫胜利果实”这一段——战争结束了，当年同寡妇岳秀英“钻瓜棚”的朱预道当了副师长，进城后同一“妖精”黏黏糊糊，结果被岳秀英发现了，二话不说就朝“妖精”脚下开了一枪。扮演岳秀英的演员叫田玲，开了枪还拍着桌子骂人。导演向她介绍我，她余怒未消，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还掂了掂手里的枪，吓得导演大喊：结束了，关机——感觉这个演员好长时间都没有从戏里走出来，深入地沉浸在角色当中。她后来讲，她喜欢岳秀英，在演岳秀英的时候，她就是岳秀英。

今天回过头想，《历史的天空》为什么成就了那么多人，因为每一个人物性格、行为、经历都有典型性，这些人物交织在一起，死缠烂打，摩擦起电，构成了《历史的天空》独特的叙事逻辑。杨庭辉知人善任、张普景刚正不阿、窦玉泉能屈能伸、东方闻音善解人意、江古碑不卑不亢、朱一刀看人下菜、岳秀英敢爱敢恨、陈墨涵忍辱负重。这些人以梁大为为核心打转转……总之，各有特色，所以表演与众不同。

青年报：现在说说《对阵》，这好像是你最近的一部长篇。我想问的是，《对阵》里的人物是杨蓼夫和郑亦雄，他们和《历史的天空》里的人物，有没有血缘关系？

你觉得《对阵》有哪些超越？

徐贵祥：关于血缘关系，这个问题问得有意思。所谓血缘，可以理解为狭义的血缘关系和广义的血缘关系。狭义的血缘关系就是血统、遗传，而广义的血缘关系则是民族性，杨蓼夫和郑亦雄，一个是八路军指挥官，一个是国民党军官。

《历史的天空》之后，我写了《对阵》。十几年间，无论对于历史的认知，还是创作经验，都有了很大的提升，特别是探究真相和揭秘方面，有了长足的进步。当初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《双重人格》，我记住了一句话：“人是一个奥秘，应该解开它，如果你毕生都在解开它，那你不要说损失了时间；我在研究这个奥秘，因为我想做人。”是啊，对于作家而言，有什么比探究真相和揭秘更重要的呢？文学如果不去探究真相和揭示奥秘，那就没有价值。

曾经，我用安徒生的两则童话表达我的文学观，《卖火柴的小女孩》和《皇帝的新衣》。文学是悲悯的事业，要给人温暖和希望。同时，文学又是讲真话的事业，就像《皇帝的新衣》表现的那样，只有那个孩子，童言无忌地说了一句：“瞧，他什么也没有穿啊。”我认为，作家就要像那个孩子，敢于披露真相，否则，我们还写什么呢？

从讲真话的立场出发，《对阵》里面每一张脸都是新的；每一个故事都是灵魂同命运的搏击；如果说《历史的天空》是从底层出发、在战斗中成长，《对阵》则于高地集结，在成长中成熟。我一直自信它是《历史的天空》的升级版。前几天得到消息，《对阵》获得“新芒文学计划”征文大奖赛一等奖，我很开心，说明我的自信不是盲目自信，有人与我有共识。